

社會運動倡議與實踐的國際奴隸博物館

Richard Benjamin 館長訪談

Richard Benjamin¹

陳佳利² 訪談、編譯

前言

2007 年開館的國際奴隸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隸屬於利物浦國家博物館群，在總館長 David Fleming 及館長 Richard Benjamin 的領導下，已經邁入十週年，展覽內容除了以常設展展出跨大西洋奴隸販運歷史與遺產外，也持續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陸續推出世界各地當代奴役特展，喚起民眾對當代奴役現況的關注。在典藏方面，國際奴隸博物館持續蒐藏與奴役主題相關的文物及藝術創作，教育活動則除了開發各種教學資源外，也為學校團體舉辦不同主題的工作坊。為配合本專題的規劃，《博物館與文化》總編輯利用 2016 年 7 月於英國進行田野調查研究期間，訪問 Dr. Richard Benjamin，請他分享關於博物館的展覽定位與願景，並就博物館在賠償及如何扮演社會運動倡議角色等議題，進行意見分享與交流。其中，國際奴隸博物館近年來加入防範仇恨犯罪連線，讓受害民眾可以在博物館中尋求協助，

¹ Richard Benjamin 現任國際奴隸博物館館長及利物浦大學國際奴役研究中心主任。
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 Co-Director of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lavery,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² 陳佳利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Professor, Head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chiali21@hotmail.com

直接參與防範犯罪之社會實踐，令人印象深刻。本刊編輯室將 2016 年 7 月 13 日的訪談精華重點節譯，以饗讀者。

陳佳利：可以介紹一下您的工作內容嗎？

Richard：我擔任國際奴隸博物館館長將近十年，我的角色非常多元，但主要是監督與規劃博物館的整體發展方向，如典藏、教育及行銷等部門未來發展方向。目前我的工作重點為規劃隔壁棟的馬丁路德區(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Building)，未來將與本館三樓的展覽以走道連結，並希望在兩三年內會開放。除此之外，我也是大英國協博物館協會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奴隸路徑計畫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UNESCO Slave Route Project)的英國代表，所以我也負責國際合作相關事務。

陳佳利：過去利物浦的海事博物館內已經設立了跨大西洋奴隸販運展廳，為什麼你們需要成立國際奴隸博物館呢？

Richard：這是個好問題。跨大西洋奴隸販運展廳於 1994 開幕，並且因應國際奴隸博物館開館而於 2006 年關閉。這兩者的願景不同，前者展覽內容比較狹窄，而從博物館的館名來看，就知道國際奴隸博物館所關注的範疇不一樣。跨大西洋奴隸販運展廳只關注跨大西洋奴隸販運及其遺產，但國際奴隸博物館自 2007 年開館以來，關注相當多不同形式的奴役及反奴役議題，如現在特展展出的正是印度當代奴役的議題（譯註：指 2015 年 6 月 2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1 日於國際奴隸博物館展出的「Broken Lives: Slavery in Modern India」特展），這在以前跨大西洋奴隸販運展廳是不可能展出的。利物浦國家博物館的總館長 David Fleming 認為這讓民眾有更多瞭解當代奴役議題的機會。雖然國際奴隸博物館已經開幕十年了，但我們所做的仍只是冰山一角，我們還需要做更多事，也希望藉由隔壁新展廳

的開幕，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當然，國際奴隸博物館目前的焦點特意放在跨大西洋奴隸販運及當代奴役議題，是因為我們不能忘了我們的歷史—利物浦城市的歷史及其與當代的關聯性。如同 David 經常強調的，我們不是中立的博物館，而是倡議的博物館，所以我們關注大西洋奴隸販運的歷史與當代議題的關聯性。經常有人問我們為甚麼不展覽其他許多議題，如古代的奴隸制度，這當然受限於資源，所以我們要有所聚焦。

陳佳利：您認為博物館能在社會運動倡議上發揮功能嗎？

Richard：當然，過去十年來我們和許多非政府組織合作，例如，**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這個歷史悠久、目前仍非常活躍的人權組織，我們一起合作好幾檔展覽和研討會，並發展教育資源。我們合作多年，而合作的關鍵在於信任。我可以很驕傲地說，他們信任博物館，也認為我們使他們的運動不一樣。雖然我們並不走在社會運動的前線，也不假裝我們很懂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但我們提供倡議的平台，且知道我們對社會倡議有影響力。每次策畫當代奴役展時，國際奴隸博物館都和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內容來自他們，我們則思考如何將這些素材轉變成為展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際奴隸博物館也在地方議題上努力，你一進入博物館會看到一個心型的圖案，那是加入反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標誌，所謂的仇恨犯罪包括種族主義、對同性戀者的仇視等。在利物浦，除了警察局、非政府組織、市政府外，還有博物館一起合作來反仇恨犯罪。假使有人遭遇了仇恨犯罪，都可以向博物館尋求援助，我們的館員會帶他們到安靜的空間，讓他們可以使用電話或尋求進一步的資源。我很驕傲地說，很少博物館會做的這些。我們所做的不只是理論，而是實踐。

陳佳利：您可以進一步分享博物館應該如何扮演社會倡議的角色？

Richard：首先，如同上述，博物館提供民眾一個類似避難的空間(譯註：讓仇恨犯罪的受害者可以尋求協助)。其次，透過展覽讓人們了解這些議題，讓他們知道世界各地發生了甚麼事。另外，國際奴隸博物館也提供空間給各個組織進行倡議活動。例如，五年前，一位年輕的黑人 Anthony Walker，與他的白人女朋友路經利物浦的公園時被謀殺。我們聯絡 Anthony Walker 的家人，告訴他們我們想蒐藏的內容，也將我們的教育中心以 Anthony Walker 來命名(Anthony Walker 中心)，你知道很少博物館以受害者的姓名來命名展廳，我們也成立了 Anthony Walker 基金會，我和 Anthony Walker 的家人(他的母親和姊姊)都是委員之一，我們每個月開會並且密切互動。Anthony Walker 基金會也積極進行防範仇恨犯罪教育，並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一樣，經常使用博物館進行各種訓練課程，這也是我們實踐的面向之一。

陳佳利：您認為博物館的展覽要如何呈現不同的觀點，如奴隸主人、廢除奴隸販運運動者和被奴役的人？

Richard：這是個好問題，你需要提供多元的論壇，指引民眾了解這個議題。在這裡，能動者(agency)這個概念很重要，例如非洲的能動者是我們發展展覽的焦點。你當然可以從廢除奴隸販運者開始，例如著名的英國廢除奴隸販運運動者 William Wiberforce 等人(譯註：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領導國會廢除奴隸販運)；但跨大西洋奴隸販運的展覽內容很廣，而我們博物館聚焦在利物浦及英國在販運奴隸的角色，因此並不特別關注個人的經驗。雖然如此，國際奴隸博物館發展展覽時，將非洲人的聲音、非洲人的經驗作為核心主題，以一個字來說，就是抵抗(resistance)；所以你在展覽中看到許多關於非洲人的抵抗，而比較少關於奴隸主的敘事。我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之前關於這個主題的主要資訊都是關

於奴隸主或者是廢除奴隸販運者，所以我們刻意決定以非洲人的經驗為主軸。最近也有人聯繫我討論教會在奴隸販運的參與，我對他們如何合理化販運奴隸的相關研究很感興趣，未來我們也可能重新檢視展覽，納入不同的觀點於展覽中。當然一開始，我們特意聚焦在非洲人經驗，這並不意謂未來我們不會增加更多不同的觀點。

陳佳利：您提到教會，是指教會以傳教為名，參與奴隸販運嗎？

Richard：沒錯，很多教會參與奴隸販運，甚至擁有大量奴隸，這在利物浦有許多的案例。在利物浦就有一個非常有名望的家族，Booker 家族，利物浦有個街道(Booker Avenue)就是以該家族姓氏命名。很少人知道他們參與奴隸販運並在南美洲擁有奴隸以開墾農場，除此之外，他們也在利物浦建立教會，是教會的創立成員之一。這是我們很少注意的面向，也是我們未來肯定會關注的議題。

陳佳利：這牽涉不同利益團體的關切，您不擔心來自各方的壓力與關切？

Richard：不，我們一點也不擔心。這不是我們要擔心的事情。

陳佳利：這又讓我想到轉型正義議題中的賠償議題，例如參與販運的皇室與教會是否應該對被奴役的非洲人後代進行賠償，不知道博物館的立場為何？

Richard：賠償議題大約在十年前開始提出與討論。我提到我是國際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在奴隸路徑計畫 (Slave Route Project) 中，許多學者與專家也開始討論這個議題，並規劃了賠償準則(guideline)，其中一點是關於經濟補償。目前可行的做法是透過經濟協助，補助各國的教育發展，但並不針對個人進行補償，因為許多專家都認為這種做法並不務實也有困難，但是否請皇室或教會進行賠償，已經超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討論的範疇。關於賠償議題，我個人非常贊成公開討論，也歡迎團體與民眾利用我們的空間討論這個議題，因為我們

的組織非常開放，也有不少人和我討論過相關議題。除此之外，因為我代表博物館及英國參加聯合國奴隸議題的討論，我也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劃的準則和總館長 David 討論過，思考博物館是否要支持這些我個人認為非常合理的準則。我認為博物館不應該對這個議題保持距離，而現階段，博物館可以成為討論這個議題的論壇；而我個人也希望可以參與並提出這個議題，讓我們觀察接下來這幾年的發展。

陳佳利：可以請問你們如何進行社區諮商？

Richard：一種做法是組成諮詢會，邀請社區居民給予意見，但這些通常是比較短期的。但你總是可以邀請人們坐下來討論，雖然是諮商性質，但他們仍有機會分享與了解我們在做甚麼。我們雖然不至於請他們一一評論我們的作法，如你喜歡這個標誌或顏色嗎？這不是我們的做法。而是你們覺得博物館是什麼？你們覺得博物館的意義是什麼？我的想法是與社區對話(conversation)，社區居民也很容易找到我，給予意見；我們的工作是聆聽與尊重不同的意見，雖然最後總要有人做決定。

陳佳利：不同的社區，如白人的社群或黑人的社群對展覽的敘事有不同的意見嗎？

Richard：當然，有不少人會告訴我們，你們為何不展這個，或者不展那個。也有人懷疑我們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故意展示特定人的歷史。但如同我告訴你，我們有自己的展覽定位，雖然有些人不贊成國際奴隸博物館的敘事，但與整體的觀眾群比較，這些是非常少數的人。也有非洲社區的年長者對我們展覽過去悲慘歷史的做法持保留態度，但你問他們是否需要成立這個博物館，他們還是支持博物館的成立。你雖然不可能獲得每個人支持博物館所做的每件事，但整體上他們支持博物館的存在。

陳佳利：學校教師會覺得這個議題很難教嗎？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如何規劃教學資源。

Richard：對老師而言我們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有許多的資源、講座和工作坊等，老師們也可以到博物館網站下載各種教育資源。當然，這個議題在英國很難教，因為從前資源很少，尤其在英國，教授這段歷史並非強制性的，雖然我們希望這個議題未來能成為課綱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很驕傲地說關於這個議題，博物館提供了很豐富的教學資源，這不是很多博物館可以做得到的。當然，教材的品質也很重要。你如果看我們的當代奴役議題的教學資源，這是和學校老師合作、諮詢他們的意見來開發的教學資源包。我們也會仔細地檢視我們的案例，視情況修改，因此這些教學資源要不時的更新，這些當然花費不少經費。

陳佳利：研究這個領域的專家，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呢？

Richard：專家當然也提供很多專業意見與內容，但我們要將他們轉化成為教育資源，要轉化成為一般社會大眾能夠消化的資料。我和這個領域的很多專家熟識，學者專家們也很樂意透過我們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這就是我所說的合作(partnership)很重要，我們和不同團體合作而不是相互競爭。

陳佳利：你最希望觀眾來參觀國際奴隸博物館能帶走甚麼？

Richard：如果有一件事是我希望他們帶走的—希望他們會再回來，也希望他們會想繼續探索這個議題或者參與當代的各種議題。當然，如果他們只是來參觀，當作一天的郊遊，或者只是享受參觀這個活動，這當然也很好。但如果有一件事是我希望觀眾帶走的，就是有人認為這個博物館開啓了他們的視野，而使他們願意參與議題。

陳佳利：聽說英國政府近年來對博物館的經費裁減，對博物館的發展有沒有什麼影響？

Richard：自 2007 年博物館成立以來，每年政府補助的經費都一直下降，尤其這兩三年受全球經濟影響更深，的確影響我們的經營，因為我們資源和館員變少，也影響我們教育活動的數量。也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架構我們的組織，並有更多跨部門的合作；雖然組織變小了，但我們仍然繼續與國際連接，觀眾參觀人數也相當多。

陳佳利：能夠談談國際奴隸博物館目前所面臨最大的挑戰？

Richard：主要的挑戰仍然是經費，國際奴隸博物館和很多人合作，但如果我們想繼續發展，我們不能只仰賴大家的捐款和協助，仍需要更多持續性的資源。

陳佳利：最後，可以談談您對國際奴隸博物館的願景嗎？

Richard：我希望國際奴隸博物館在奴隸議題研究與傳播上，成為全球領導的機構，其中很重要的當然是研究。現在世界上有幾個奴隸相關主題的博物館，如在加勒比海國家及非洲等地都有，我們當然不是唯一的一家，但我們是唯一國立的，擁有國家級資源的。世界上也有很多奴隸研究機構，他們花費比我們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相關議題的研究，我們也和他們密切合作，例如，我也在利物浦大學的國際奴役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lavery)擔任主任十年了。換句話說，如果將典藏與研究這兩者加在一起，我想我們應該擁有優勢，而我的願景則是國際奴隸博物館在奴隸議題相關典藏與研究能夠領先全球。

陳佳利：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台灣的讀者將受益良多。